



日本中國學文庫

王晓平◎主编

中国古典文化景致

〔日〕兴膳宏◎著

李寅生◎译



中華書局

日本中國學文萃

王晓平◎主編

中国古典文化景致

〔日〕兴膳宏◎著

李寅生◎译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文化景致/(日)兴膳宏著;李寅生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5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7-101-04623-1

I. 中… II. ①兴…②李… III. 随笔-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880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古典文化景致 |
| 丛 书 名 | 日本中国学文萃 |
| 著 者 | 〔日〕兴膳宏 |
| 译 者 | 李寅生 |
| 责任编辑 | 梁 彦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½ 字数 210 千字 |
| 印 数 | 1-4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4623-1/I·609 |
| 定 价 | 24.00 元 |
-

总 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



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



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



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的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



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了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前 言

我的学术专著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发行，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次了。第一次出版的学术专著是《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译为彭恩华先生，该书于1984年6月由齐鲁书社出版。正是这一年的11月，在上海举行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为了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会，这部书便似乎在匆忙之中出版了，书中只收录了1982年我发表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等四篇论文。我本人由于初次参加这类会议，于是便直接写了这本书。对自己的专著在中国的学术界所获得的高度关心感到有些超乎想像，它既令我惊讶，同时又让我心存感激。

在此之后第二次出版的学术专著是《六朝文学论稿》，译者仍是彭恩华先生，该书于1986年6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在这部书中，共收录了我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关于六朝文学的论文19篇。彭恩华先生在前面的《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的序中，叙述了翻译我有关六朝文学论文的宗旨，不久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实现了。现在，把我的相关资料整理之后送给彭恩华先生并和他取得联系，我所写的相关学术论文最近也翻译成书了。



随着日本与中国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我在中国的学术知音也逐渐多了起来,我的单篇学术论文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在发表的论文中,既有中国朋友帮助翻译成汉语的,也有我本人用汉语写成的。这些学术论文究竟有多少,我自己也记不太清楚,但数量不少却毋庸置疑。它们在中国的学术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虽不得而知,但自己的著作能有机会展示给广大中国读者,却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情。

这次与我商谈把我的新著刊行出版的,是王晓平先生。他告诉我,这次出版的不是像从前那样的“研究论著”,而是“学术随笔”。于是我便拿出了1995年出版的杂文集《异域之眼》(筑摩书房出版)和去年秋天出版的杂文集《中国古典文化景致管窥》(研文出版社出版)两本书。书中的内容能否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我尚不能做出十分的肯定,但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意义。

为我这本新著担任翻译工作的是李寅生先生。李先生是以前翻译我的《略论〈岁寒堂诗话〉对杜甫与白居易诗歌的比较评论》(《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1期)论文的老相识。收录杂文的两本书,由他随意选一些文章进行翻译,具体选用哪些内容也完全由李先生来决定。李寅生先生专心致力于学术翻译,我相信他会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的。对李先生的努力,我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本书如果能够受到中国读者的关心,那么笔者将更是不胜感激。

兴膳 宏

2004年8月12日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古典文化的风景	1
古典与现代的融合	3
中国人的幸福观	18
诸葛亮与曹操——由《三国志》所想到的	25
《七步诗》为什么是七步呢?	31
所谓“六朝时代”	38
李白与月	45
漉我新熟酒——酿酒自乐诗赏析	62
中国古代的诗人与他们的饮食生活	67
诗人与“食”——嗜食好饮的白乐天	87
菅原道真与白居易	95
双重矛盾说——读弗朗索瓦·朱利安《无味的礼赞》	99
汉诗人北条霞亭	101
森鸥外的汉诗	106
词语与理论	111



空海与《文镜秘府论》	121
夏目漱石与中国	126
《静夜思》种种	131
日中秀句考	136
冥界的星座——关于古代中国人的坟墓现象研究	153

第二编 研究中国文化的先贤们

那一刻——我想起了吉川幸次郎先生	167
吉川幸次郎先生其人及其学问	171
关于吉川幸次郎先生《杜甫私注》之我见	180
小川环树先生其人	186
性格内向的先生——小川环树	190
小川环树先生之韵	196
从有关敦煌资料所想到的一些逸事——记小岛祐马先生	199
小岛宪之《汉语逍遥》的世界	202
铃木修次先生与我	212
入矢义高先生之残留印象	214
福永光司先生的故事	218
向日野龙夫先生致敬	222
视天茫茫——悼高桥和巳先生	225
豹轩——铃木虎雄	235
滑稽故事与唠叨念佛——海知义先生生前追悼戏文	243



第三编 异域之眼——中国文化札记	249
博物馆的追思与怀想	251
2000 年中国退休纪行	255
我与日本中国学会的最早体验	260
日本中国学的位置	264
追求真心——《京都大学文学部专修案内》序言	268
京都大学文学部讲义	270
星期四话题——2000 年 7 月—12 月	273
素食之美	300
仁者乐山	301
曲艺之乐	303
火钵骚动记	305
 云过长安之空——代后记	 308
译后记	312



第一编

中国古典文化的风景

古典与现代的融合

一

文学作品不一定是通过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理解的。作者虽有很大的自信,但其所创作的作品却并不一定受到读者的欢迎;而意外的失败之作也有获得好评的时候。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之难,正如中国六世纪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知音篇》所说: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

“知音”原本是指对音乐的理解而言的,但在这里的“知音”被一般化了,指的是对作品的理解,有时也指那些具有较好理解能力的读者。如按《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所言,读者“多贱同而思古”,即通常轻视同时代的人而思慕古代的人。秦始皇和汉武帝便是这类人中的典型例子。《史记·韩非列传》载,秦始皇在读